

二、战争思想

思想是行动的指针，是力量的根源，一种战争必有一种战争的思想。德国兵学大师克劳塞维慈在其不朽的杰作「战争论」一书说：「战争是起因于战事爆发时所存在之各种思想观念等关系，复因此等关系，而使战争有种种形态。」

中国过去的历史是战争起伏的历史，今后的历史，在世界末大同前，当然也免不掉战争的发生，但今后的战争思想，是不容再分歧或错误了，分歧则力量分散，难期胜利，错误则轻举妄动，祸国殃民。所以必须建立一种正确的战争思想，以为今后战争行动的南针。

尤其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主义思想的战争，正如日本军事家土居明夫说：「下次战争是主义与世界观的战争。……下次战争倘若是主义思想的战争，物质的战争，长期的战争，则主义思想的光明正大者，资源生产、科学技术优越者胜利，在综合此种战力的总体战上，能胜者胜利。」（注一）足见这个无形的战争，与有形的军事武力的战争有着同样的重要性。在主义思想的战争中，其光明正大者必可获胜，反之必败，稍一检讨过去我们北伐的胜利，及法西斯德日意在二次大战中的失败，已可得到答案，这更使我们非从速把我们的战争思想建立起来不可。

纵观现代世界的战争思想，自德日意失败之后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思想体系经已崩坏，迄今犹存的，可分为两大体系：一为民主主义的战争思想体系，一为共产主义的战争思想体系，前者以自由与和平为目的，美国为其代表，后者以侵略与奴役为目的，苏俄为其代表，两相比较，已可推断苏俄在来日三次大战中是必败的。

今日我们所要建立的战争思想，当然是反对俄式共产主义的战争思想，而应与美国诸民主国家的民主主义的战争思想相协调，相一致，始为「适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群之需要。」（「自传」）

大凡战争思想是政治思想的反映，国父的三民主义是我们的政治思想。自然我们的战争思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战争思想，即为实行三民主义，造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而战的战争思想。但为实现三民主义，在现阶段，首要反共抗俄，可见今日世界各民主国家亦莫不正在反共抗俄，

可见反共抗俄是国际性的，非一二国家的事，亦唯有全球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，始可争取反共抗俄的胜利。

正如下面所述，三民主义的战争思想的本质，是为求生存，求和平的，又是反极权的，反侵略的，这是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思想相协调，相一致，抑且更为进步和完美。因为民主主义倘带有资本主义的韵味，而三民主义则无。所以今日为建立中国的战争思想，只有从三民主义中（国父全部遗教俱可归结于三民主义）来发掘和建立了。

克劳塞维慈氏关于战争的定义说：「战争的基本要素，是两人以上之间的鬪争，即决鬪，战争不外是决鬪的扩大。」跟着说：「战争是为屈服敌人，以实现我意志所用的暴力行为。」国父对于战争这个术语，虽然没有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，却说过：「人同人争，国同国争，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，……国内相争，人民同君主相争。」（「民权主义」第一讲）克氏又说：「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的行动，实为一种政治的手段，政治上对外关系的一继续，而以其他手段（暴力行为——浴日注）施行之。」国父亦认战争属于政治的形态，他说：「政治的海陆军力」，跟着又说：「应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国家有两种手段：一是兵力，一是外交。」（「民族主义」第二讲）所以我想国父一定读到克氏「战争论」而受其影响的。于此，我可再举出一些例证来：克氏说：「凡为指挥一种战争或一幕战役的重大活动，而取得光荣的胜利，非具有政治上的特别高见不可，所以战争和政治是一致，将帅也是政治家。」国父说：「现代军人只懂得军事是不够的，军事以外还必须了解政治。」（「政治基础在于地方自治」谈话）又说：「如果说军人不干涉政治，还可以讲得通，但说不懂政治，便讲不通了。用为政治的原动力便在军人，所以军人当然要懂政治，要明白什么是政治。」（「民权主义」第一讲）克氏「战争论」是世界军事名著，也是一种战争哲学，不特军人应该精读，即一般思想家亦应人手一卷。它是政治家、外交家、愿问及一切与政务有关者的枕中秘本。诚如国父的好学与博学，尤以指导战争的需要，自不会不知道这部名著，又不会不加以深刻研究，虽说目前未找到更确凿的证据，但依于上述的对照已可以推知其究竟了。但国父与克氏亦有不同点，就是国父不是克氏为战争而战争的论者，乃是为革命而战争的论者，他一面反对「野蛮」与「弱肉强食」的侵略战争，另一面却主张「以战止战」，「为人类作干城，为进化除障碍」的革命战争。（「战

争入门序」)亦即为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战争,可见他的战争思想比克氏来得正确和进步。

其次,国父对于战争发生的见解,不是看做偶然的现象,也不是看做经常的现象。他认为有国家即有战争,战争是国家间不可避免的现象,又为一种不得已的举动,他说:「论国家之起源,大概以侵略人之目的,或以避免人侵略之目的而为结合,其侵略人固为战争,即欲避人侵略亦不能避去战争。……以一国而为战争,万不得已之事也。……凡国家之政策既定,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自的,外交手段既尽,始可及于战争,战争既毕,仍当复于外交之序。故国与国遇,用外交手段与用战争手段,均为行政策所不可阙者。然用外交手段之时多,用战争手段之时少,用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轨则,战争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。不得已云者,外交手段既尽,无可如何之谓也。」(「中国存亡问题」)他又认为在革命过程中,战争亦为不可避免的现象,诚以革命是最艰巨的事业,或为推翻统治者,或为打倒侵略者,不是完全采取和平的手段所可奏效,不得已时还要诉诸流血的战争。故国父致力革命之始,即揭橥「趋除鞑虏」的纲领(「同盟会宣言」)。又在手订建国大纲上制定「军政时期」为革命建设步骤的第一个时期,即第六条:「在军政时期,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,政府一面用兵以扫除国内之障碍,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,而促进国家之统一。」于此又可见国父并不同过去法西斯主义者讴歌战争为「创造之父,文化之母。」又不同现在赤色共产主义者以阶级鬭争为社会进化原动力,到处发动侵略的战争。至于根据国父最高的理想,战争并不是永远不会消灭的,却有待于大同世界的实现。这个大同世界的内容,正如国父亲书礼记大同篇说:「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,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,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。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,故外户而不闭,是谓大同。」这便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,亦即三民主义最高理想的实现。

国父的战争思想是三民主讲的战争思想,已如前述,而我们基于战争哲学的观点,在国父的全部遗教中,却可以发现他的战争思想是立足于「生存」与「和平」的基础之上,即它的本质是为「生存」与「和平」而战。兹分述如下:

一、为生存而战

这可以说是国父战争思想的核心。三民主义的基础是民生哲学。国父说：「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」就是经济的中心，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，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。」（「民生主义」第一讲）又说：「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，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。」（同）又说：「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，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，才是历史的重心。」（同）再又说：「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，就是因为要求生存，人类有不间断的生存，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，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，是人类求生存，人类求生存，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。」虽说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，却是人类求生存的一种手段，亦即说人类社会民族国家遭受生存的威胁——别国的侵略时，则非断然采取战争的手段不可，否则，便不能自卫，维持其生存，而陷于灭亡。至于侵入人国，以掠夺财富，扩大空间为目的战争，则非革命的战争，自然亦非国父所谓「求生存。」国父说得更明白：「人类如能够生存，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：第一件是保，第二件是养，保和养两件大事，是人类天天要做的，保就是自卫，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或国家，要有自卫的能力，才能够生存。……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，便要奋鬪。（注二）（「民权主义」第一讲）这里所谓自卫的能力，当然是指武力，唯拥有足以自卫的武力，亦即能战的武力，始能维持民族国家的生存。又说：「吾中华民族，和平守法，根于天性，非出于自卫（即为求生存——浴日注）之不得已，决不肯轻启战争。」（「临时大总统告友邦书」）亦即说战则为求民族国家的生存。而非为侵略。又说：「吾人初不以黷武善战策我同胞，然处竞争据烈之时代，不知求自卫之道，则不适于生存。」（「精武本记序」）又，国父于民元解职后，在香港与西报记者谈话说：「惟吾意中国无侵略志，因吾人志尚和平。吾人之所以要水陆大军者，只为自保（即为求生存——浴日注）而非攻人，若果欧人势逼吾人，则吾人将以武力强国。」（「南北统一后之政治与外交方针」谈话）依此可见国父的战争思想是以民族国家的生存为核心，昭然若揭。他发动推翻满清，是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，他主张抵抗帝俄，也是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，他屡次兴师讨贼，也是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。至于我们过去对日抗战，与现在的反共抗俄，也是继承国父的遗志，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。本来鲁登道夫将军在「全体性战争」一书上，也是主张为求生存而战的，他说：「全体性的战争之目的，在于民族生存之维持。」实则他仅为求大日耳曼民族的生存，在大日耳曼民族生存的大前提之下，他可以牺牲别个民族的主存，

即他只要自己民族的生存，不要别个民族的生存。我国父则比他正确和进步，即要自己民族国家的生存，同样也要别个民族国家的生存，扶助别个民族国家的生存，正如国父所主张的「济弱扶倾」。（「民族主义」第六讲）

二、为和平而战

和平与战争本是对立的现象，也是统一的现象。主张和平不能否认战争，主张战争亦不能否认和平。但我们今后的战争，则不可徒为战争而战争，更不可为侵略而战争，应为和平而战争，战则要打破一切不和平的现象而使归于和平，亦即说战争仅为和平的手段，而和平才是战争的目的，唯有这样才是革命的战争。这便是国父战争思想的第二个本质。中国人的天性，爱好和平，国父的天性更爱好和平，不得已而战，乃以和平为目的。民元前一年在香港舟次对胡汉民说：「且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，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，何必以兵？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，如能创建政府，则满清之政府固必倾覆，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，必不足以为患于新政府，故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，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也。」（「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即不必用其兵」谈话）于此可见国父不是一个好战者，也不是一个武力崇拜者，其爱好和平的天性溢于言表。民十四逝世的弥留时对同志说：「余此次放弃两广北上，实为和平统一而来，」又反复断续的说：「和平！奋鬪！救中国！」益见爱好和平的天性。爱好和平既是国父的天性，至于不得已而战，系为和平而战。国父说：「中华民国之创造者，其目的为和平。」（「实业计划结论」）这是说为打破满清对我汉族的不和平，才发动推翻满清的战争，依于战争的胜利，而创造中华民国，即创造新的和平，达到和平的目的。尤值得注意的，国父发动推翻满清的战争系出于不得已而在和平绝望之后，民元就临时大总统告各友邦书说：「自满清盗窃中国，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，其间虐政，罄竹难书，吾民族唯有隐忍受之，如倒悬之得解，求自由而企进步，亦常为改革之要求，而终勉求所以和平解决之道，初不欲见诸流血之惨也。屡起屡蹶，卒难达吾人之目的，至于今日，实忍无能忍。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，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，是用诉之武力，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鞬。」民十三神户演讲说：「要请欧洲人之在亚洲者，俱以和平方法，退还亚洲人之权利，如果不能达到目的，便当诉诸武力。」（「大亚洲主义」）这是说和平方法失效后，始可诉诸战争，战争则为达到和平的目的。其次国父常赞扬中国人素爱好和平的天性说：「中国人民本甚和平，现在世界上，立国百有

数十，雄强相处，难保不有战争发生。惟中国数千年来，即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，人人均抱有此种思想，故数千年来之中国，纯向和平以进行。中华民国有此民数，有此民习，何难登世界舞台之上，与各国交际，共谋世界之和平。此种和平运动，即中华民国国民之天职。」（「中国人之天职在促进世界和平」讲词）又指出爱和平为中国一种极好的固有道德说：「中国更有了一种极好的道德，是爱和平。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民族，只有中国是讲和平，外国都是讲战争，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。近来因为经过许多大战，残杀太大，方主张免去战争，开了好几次知平会议。像从前海牙会议，欧战之后的华赛尔会议，金那瓦会议，华盛顿会议，最近的洛桑会议。但是这些会议，各国人共同去讲和平，是因为怕战争，出于勉强而然的，不是出于一般国民的天性。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，论到个人便重谦让，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，和外国人有大大的不同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种种的旧道德，固然是驾乎外国人，说到和平的道德，更是驾乎外国人。这种特别的好道德，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，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，不但是要保存，并且要发扬光大，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。」（「民权主义」第六讲）并再三呼吁「维持世界和平」（散见遗教中），我们深望外国人能够了解我民族暨国父这个优点。同时也希望外国人亦能具此优点，不来侵略我们，又不去侵略人家，共同维持世界的和平。

要之，爱好和平的精神是贯通着国父整个思想的，其表现于战争上，则为「为和平而战」。我们过去对日抗战及今日反共抗俄，就是争取中国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，同时也是发扬国父倡导和平的伟大精神。

以上系就国父战争思想的本质，亦即战争的基本观念，以下我且就形式上，亦即战争的对象来谈，这是上述本质的进一步说明，而后者「为抵抗侵略而战」又成为前者「为铲除障碍而战」的说明。

三、为铲除障碍而战

国民革命的障碍有三：一曰专制君主，一曰封建军阀，一曰帝国主义，这三大障碍物，如果没有根本铲除，则国民革命无由成功，民族国家亦无从生存发展与和平。但欲根本铲除这三大障碍，除作和平的奋鬪外，不得已时还须诉诸流血的战争。所以国父当进行推翻专制君主的满清之时，便倡率起义，采取战争手段。同盟会宣言说：「满清政府，穷凶极恶，今已贯盈，义师所指，覆彼政府，还我主权。」自满清被推

翻之后，继之而起便是封建军阀，于是便先后实行讨袁、护法、讨莫、讨陆、讨陈、讨沉及北伐曹吴。国父说：「军事的奋鬪，推翻不良的政府，赶走一般军阀官僚。」（「党员不可存心做官」讲词）又说：「四年以来，爱国之士，讨伐军阀及卖国贼，无非为护法主义及国家生存计，此不能名为南北之争，实共和主义与军阀主义宣战，爱国者与祸国者宣战而已。」（「就非常大大总统后对外宣言」）又说：「今将开始一新时期，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，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。」（「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」）又说：「北伐之目的，不仅在覆灭曹吴，尤在曹吴覆灭之后，永无同样继起之人。换言之，北伐之目的，不仅在推倒军阀，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。盖必如是，然后国民革命之目的，乃得以扫除障碍之故而活泼远行也。」（「北上宣言」）并在民族主义里强调打倒帝国主义，民权主义里强调打倒封建军阀，因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不打倒，则民族、民权主义无从实现，民生主义亦无由著手。过去北伐的成功，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（抗战胜利）。可以说国民革命的障碍殆已经铲除净尽。否料，朱毛共帮又继起与俄帝狼狈为奸，盘据大陆，钳制人民，屠杀无辜，摧残民族，出卖国家，成为我们国民革命的新障碍。今日我们正欲打回大陆，肃清共帮，驱除俄帝，就是为铲除国民革命的新障碍，亦可谓：「为反极权而战」，「为自由而战」，因共产太极权太剥削人民的自由了。

四、为抵抗侵略而战

一国当外患之来，很明显的，抵抗就是自卫的生路，屈服就是自杀的死路。大凡一个民族国家之亡，是亡于失败主义，投降主义。如抱着抵抗主义，为抵抗侵略而战，亦即所谓「为反侵略而战」，有时虽告失败，终必获胜。近代中国受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达于极点，故国父在民族主义里大声疾呼民族精神以抵抗之，说：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，对于世界列强要抵抗他。」又说：「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，在自己先有团体，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体来顾国家，便有办法，无论对那一个，都可以抵抗。抵抗外国的方法有两种：一是积极的，这种方法，就是振起民族精神，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鬪。二是消极的，这种方法是不合作，不合作是消极的抵抗，使外国的帝国主义减少作用，以维持民族的地位，免致灭亡。」始终未主张侵略人家，不独不主张，且反对之。又在其手订建国大纲上订有「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，政府当抵御之。」的条文，这是进而确定抵抗侵略为国策的。又国父实业计一

书的结论说：「今则日本之军阀政策，欲以独力并吞中国……今中国已醒觉，日本即欲实行其侵略政策，中国人亦必出而拒绝之。」这是国父主张「为抵抗侵略而战」的更具体主张，亦即我们过去对日抗战的根据，依于抗战的胜利，果得维持中华民族的生存，亦尽了维持世界和平的义务。

至于俄国处心积虑之欲亡我，国父早已洞若观火，见于民前十三年撰支那现势地图跋说：「中国舆图以俄人所绘者精审，盖俄早具萧何之智，久已视此中华土地为彼囊中之物矣。故其考察支那之山川险要，城郭人民，较之他国舆地家尤为留意。」今日以大彼得自命，又继承沙皇衣钵的大独裁者史达林，朱毛共帮已为其所控制，而把中国整个大陆作「囊中之物矣。」不待说，这是我们民族遭受着一次空前未有的大侵略，我们为维持民族生存与世界和平，则非反共抗俄不可，尤应与世界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打倒莫斯科，把国父抗俄的精神与计划实现于今日！

当民国元年，帝俄侵我外蒙古甚急，制造所谓「库伦独立」，旋以俄蒙协约，迫我承认，野心勃勃，节节进逼，駸駸乎有囊括我东北各省之势。这时国父为打破这个危机，便以在野之身，坚决地提出对俄抗战的主张，在其钱币革命通电上说：「今者俄人乘我建设未定，金融恐慌，而攫我外蒙古，以常情论之，我万无能抵抗之理，在俄人固知之素，而审之熟，故甘冒不韪行之。我国人皆知蒙亡国亡，与其不抗俄屈辱而亡，孰若抗俄而为壮烈之亡。」跟着说：「与其俯首听人之瓜分，何若发奋一战，以战强俄，而固我国基于万代之为愈也。况当此民气正盛，国体方新，战有必胜之道，不战为必亡之阶，孰利孰害，不待智者之决也。纵以常理论之，今日战亦亡，不战亦亡，与其屈于霸道强权而亡，不如一殉人道公理而亡，一战不独不亡，而更可扬国光，卫人道，伸公理于世界也。」国父为纠正当时北京政府和议派的错误主张，在该电文上又大声疾呼说：「语曰：『能战而后能和』，惟我今日不能战，故俄敢公然侵我领土，若徒然与办交涉，与之言仲裁，悉归无效。」国父这个伟大的主张，因当时北京军阀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，未能实现，致把外蒙古的主权断送于俄人。可见不抵抗主义的危险。至于国父当时抗俄的作战计划，系主张采取长期的作战计划，正如该电文说：「必备屡战屡败而气卒不挠，乃能求最终之一胜。语有之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今俄有常兵百万，战时兵五百万，我现在练兵五十万，民兵无量数。就俄之现势而观，六个月之内，必难出至五十万兵，而我则于此期之内，

可出五十万。于外蒙北满六个月之后，又可加练新兵五十万。然以此而敌俄，在第一年之战，胜负未可知。惟第二年，我当出兵二百万，意料中当可逐俄出满蒙之野，而复我黑龙江沿海州之侵地。然万一仍败，则第三年当出兵四百万，若犹不能得利，则第四年当出兵六百万，则未有不战者也。在此期内，俄必有财政之恐慌，革命之起义，与我可乘之隙者甚多。若彼犹不屈服，则期第五年之大举，必出兵至八百万或至千万，必直抵莫斯科圣彼得堡而后已。」真是我们今日反共抗俄的南针。

以上便是国父战争思想的本质，亦即国父的战争观，依此而论，自然他是反对军阀的战争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，关于前者，他说：「军阀惟知以武力据地盘，以欺诈权利。」（「覆萧翼、杨道馨函」）国父厘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亦说：「事实上，不能禁军阀中之一派不对于他派而施以攻击，且凡属军阀莫不拥有雇佣军队，推其结果，不能不出于战争，出于抢夺，盖抢夺于邻省，较之抢夺于本省为尤易也。」关于后者，他说：「国际战争者无他，纯然一简直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耳。故对此种强盗行为，凡有心人，莫深疾痛恨之。」（「实业计划结论」）又说：「欧洲数年大战的结果，是不能消灭帝国主义，因为当时的战争，是一国的帝国主义和别国的帝国主义相冲突的战争，不是野蛮和文明的战争，不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。所以战争的结果，仍是一个帝国主义打倒别个帝国主义，留下来的还是帝国主义。」（「民权主义」第四讲）关于阶级战争呢？国父认为阶级战争，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，在今日的中国则不能发动此种战争，他说：「阶级战争，即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也。此种之战争，现已发动于各工业国家者，极形剧烈。在工人则自以为得最后之胜利，在资本家则决意以为最苦之压迫，故此战争，何时可以终局，如何可以解决，无人敢预言之者。中国因工业进步之迟缓，故就形式上观之，尚未流入阶级战争中。吾国之所谓工人者，通称为苦力，而其生活只以手为饭碗，不论何资本家，若能成一小工店予他等以工作者，将必欢迎之。况资本家在中国寥若晨星，亦仅见于通商口岸耳。」（「实业计划结论」）

此外，我们可以证明国父也是一个总体战的倡导者，虽说总体战（**Totale kriege** 有译总力战，或全体性战争）的理论，倡导自德国名将鲁登道夫，其根据是第一次欧战的经验和教训。国父所拟着「国防计划」一书，亦系根据第一次欧战的经验和教训，虽说该书尚未完成，而国父先逝世，在其拟就的该书大纲草案里，却可窥见国父早已具有总体战的

观念，——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端和军事一起来论列。（请参阅下章「国防建设」）又从本书「战争与政治」，「战争与经济」，「战争与宣传」诸章来看，更可证明国父是总体战的倡导者。原来国父的思想是「迎头赶上去」的，自然他的战争思想也不能例外。这一个总体战的方式，正是我们今日反共抗俄战争的最高指导。

总之，国父的战争思想是革命的，是救国救世的战争思想，换言之，是以「仁」为中心（注三）并以「世界大同」为最高理想的三民主讲的战争思想。这个光明正大的战争思想是比民主主义的战争思想为进步与完美，（请注意！尚须表现于实际行动，方能发生伟大的作用）最后必能粉碎万恶的共产主义的战争思想。我们应从速把它弘扬于全世界，蔚为民主国家战争思想的主流，争取反共抗俄战争的早日胜利。

- （注一）见日本大陆问题研究所所长士居明夫中将着：「美苏战争的预测」一书，一九五二年出版。
- （注二）国父所说的「奋鬪」，据我的研究，可分为和平的奋鬪，军事或战争的奋鬪，他说：「军官学校教学生，用枪炮去奋鬪，这个讲习，是教学生用言语文字去奋鬪，即和平的奋鬪。」（「言语文字的奋鬪」讲词）
- （注三）国父说：「我们南方革命，大家知道牺牲了多少性命，流了多少鲜血，这是为什么？无非是想革命成功，造成一个很安乐的国家，让人民可以享幸福，抱这种宗旨去奋鬪的军队，才是仁义之师。滇军这次到广东来，继续顾总司令的志气，为革命奋鬪，费了很大的牺牲，真是仁义之师，所做的大事，可算是一半成功。如果现在去北伐，收复江西，统一中国，便是要做的大事，完全成功。」（「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」讲词）